

得，一个人投身航海只是一个人，你再出色也只能驾驶一条船。而教育则是造就许多人才，可以驾驶许多船舶的大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参与了航海教育的开拓性工作。先后在上海航务学院航海系、大连海运学院、广东航运学院、广东交通学院任教并兼任航海教研室主任，并经交通部任命作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广州分院筹备组顾问，该院正式成立后则作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广州分院顾问，并担任广东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海军广州舰艇学院海员专业训练顾问。

在投身航海教育的同时，他还编著了大量航海的教科书及面向大众普及性航海著作，计正式出版的著作包括：《航海学》《雷达与航海》《近代航海方法》《海上航行注意事项》《雾中航行》《航海推算》《海图作业须知》《海上船舶避碰》《双曲线系统无线航海仪器的定位原理和方法》；翻译著作有：《航海学》《利用扇形无线电指针在海上测定船位》《船舶操纵要素及计程仪改正定量的测定》。上述著作均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1964年，交通部决定由广州海运局牵头，筹建广州航海学会，李景森被指定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从此，他在航海学会工作了27年。在学会刚成立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作为副秘书长，不算“走资派”，他利用这段时间潜心研究，注重普及航海知识，根据自己多年的航海经验总结编写了《船舶防台》等科普著作，与珠江电影制片厂联合编拍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油轮安全问答》《油轮防爆》《油轮安全管理》，广泛地宣传了海上航行安全的知识。

李景森几十年来醉心于航海教育、科研与普及工作，从不知疲倦，因为他出色的工作和对航海事业的不懈追求，1978年，他代表广东省航运界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光荣地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并合影。

在我们采访他的时候，93岁高龄的他依然一派军人的作风：白色的短袖衬衣烫得整齐笔挺，坐在凳子上腰杆直挺。我们感受到他的心依然牵挂着大海。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可以说是海洋大国了，但离海洋强国还有很远的距离，还需要一代一代人不懈的努力。”“我现在可以做的就是，以自己大半生所经历的中国因海洋事业落后被人欺负的经历，不断地呼吁年轻的一代投身海洋，呼吁国家更注重发展海洋事业。没有现代的强大的海上力量，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永兴岛今貌

孙琬、戴恩赛和他们的孩子

余齐昭

《文史纵横》精选（二）

孙琬、戴恩赛这个家庭开始让人羡慕，但结局则让人唏嘘叹息。

孙琬（1896. 11. 12—1979. 6. 10），是孙中山与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于檀香山。早年漂泊海外，1912年2月与母亲卢夫人、长兄孙科、大姐孙姪从海外到南京与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父亲孙中山团聚。1912年6月28日与兄、姐从上海出发经檀香山赴美留学。

在留美期间，孙琬与王伯秋（原名纯涛）结婚，婚后生女王纘蕙，生子王弘之，不久分手，子女归男方。

在此，首先交代一下关于孙琬的名字问题。孙姪、孙琬姐妹的名字由父母亲所定。这可从1910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赴欧洲旅途中致函两女时开头便称：“爱女姪、琬收看”，1912年12月17日孙中山致函袁世凯时称：“文有一男名科，已入美国大学，一媳陈氏，又有二女名

姪及婉，皆在美洲中学。”孙姪（1894.3.31—1913.6.25）不幸早逝，其在翠亨孙氏墓地的墓碑上镌刻着“显十九世祖妣孙姑姪之墓”字样。“姑”为称谓，因其未婚嫁。

然而，孩子成年后，有自己选择名字的权利。1912年6月孙婉在上海做的身份证自称：“本人姓名孙琬”，自此以后，以“孙琬”行世，直至逝世。其墓碑碑文为“戴母孙琬夫人灵骨谨葬于此”。

1922年6月10日从澳门寄广州东山烟墩街二号的信称“孙琬三姑玉展”；1968年2月15日她致蒋介石函中自称“琬”，落款“戴孙琬”。1981年6月25日，戴成功造访中山大学时面告笔者：“我母亲名琬。”

至此，可以认定，孙琬，原名婉，16岁以后以孙琬之名行世。

戴恩赛（1892.5.6—1955.1.16），广东长乐（今五华）县人，出生于香港。191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堂备馆（中学），后就读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获法学博士学位。关于戴恩赛获法学还是哲学博士问题，各种资料有不同版本，《孙中山辞典》戴恩赛词条中说是哲学博士。1998年10月29日戴恩赛的外甥（他姐姐的儿子）卓先生从云浮打电话给笔者，纠正笔者1998年7月23日在《羊城晚报》上发表《戴恩赛应为孙中山女婿》一文中所说戴为哲学博士一说，他说应为法学博士才对。可信。

戴恩赛1918年回国，1918年任中华民国外交部司员，1920年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调查会常任会员，1921年任广西梧州市市政厅长（即梧州市长），1923年任梧州关监督兼外交部特派广西交涉员，1927年任广东治河事宜

处督办，1936 年任厦门关监督，1929—1933 年任中国驻巴西国特命全权公使，1937 年任粤海关监督，1938—1946 年任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即中山纪念中学）代理校长（校长孙科）。

关于驻巴西公使的任职时间，各种资料记述不一，辞职时间有 1931 年、1932 年和 1933 年三种，哪一年才准确？我采信官方出版物《国民政府职官年表》，对戴恩赛任驻巴西公使时间的记载是：1929 年 2 月 27 日任命，同年 11 月 28 日就职，1933 年 8 月 9 日辞职。

在戴恩赛的所有任职中，出使巴西公使的官阶最高；任中山故居纪念中学代校长的时间最长，从 1938 年 10 月至 1946 年 8 月，共 8 年。1947 年曾参选第一届国大代表澳门区侨选代表选举。1949 年 10 月，回澳门生活。

1921 年 3 月 19 日，孙琬与戴恩赛在澳门孙公馆由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孙科主持婚礼，婚后女儿戴成功、儿子戴永丰相继在香港出生，丈夫戴恩赛历任公职，妻子孙琬相夫教子，一家其乐融融。

孙琬与戴恩赛结婚后，与继母宋庆龄、父亲孙中山关系融洽。他们结婚时宋庆龄致函孙琬，祝福他们生活幸福，并送上礼金 4000 元。1922 年广州“六·一六”事变后，戴恩赛与孙科、孙中山顾问那文一同护送宋庆龄从广州至香港，当晚宋住戴恩赛朋友莱恩太太家中，第二天，戴恩赛与孙科又护送宋庆龄到上海，安抵莫利爱路孙中山住宅中。

同年 8 月 9 日，孙中山要离永丰舰返上海时，该舰官兵情绪激动，怕孙中山离开后他们生活无着落，不让孙中山离去。此时戴恩赛自动留舰上，安抚官兵，并答应筹款

发饷，第二天官兵领到饷银后才让戴恩赛离舰。

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时立下国事、家事两份遗嘱，戴恩赛是九位遗嘱证明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他撰挽联悼念：

三民主义阐化万方，九原应无遗憾；

半子恩情侍疾三月，寸心唯以永伤。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遗体奉安南京中山陵。5月18日，戴恩赛、孙琬夫妇与孙科夫妇到北平火车站迎接从欧洲回国参加孙中山葬礼的宋庆龄，并即陪同宋庆龄到碧云寺谒灵。5月底，他们在碧云寺参加孙中山遗体换棺、大殓、建立孙中山衣冠冢的各种仪式，并护灵南下南京奉安。最后，宋庆龄带领孙科夫妇、孙琬夫妇等关上孙中山灵寝墓门，奉安大典告成。

1952年3月因儿子戴永丰不幸病逝而深受打击，戴恩赛突然中风，瘫痪三年，于1955年1月16日病逝澳门，初葬澳门，后迁葬香港戴氏墓地。

自儿子戴永丰、丈夫戴恩赛逝世后，孙琬与女儿戴成功相依为命，艰难度日。1971年除夕即1月26日，孙琬在家跌倒，盆骨粉碎性骨折，由澳门华人领袖、澳门镜湖医院值理何贤送至澳门镜湖医院住院医治，并转告我国政府。周恩来总理生前对孙琬一家备极关怀，指示在经济上、生活上给予全面照顾。孙琬跌伤后，我国政府派出医疗组会同镜湖医院医护人员，悉心为她治疗。留医期间，医院一直安排孙琬在超等病房治病；免收一切费用。中国政府通过驻澳门机构“南光行”〔即南光（集团）有限公司〕每月拨3000港元作为孙琬母女的生活费。1979年6月10日孙琬病逝于该医院。何贤主持追悼会，并宣读祭

文，介绍孙琬生平事迹。孙琬逝世后葬澳门氹仔孝思永远墓园，1989年4月15日灵骨迁香港与丈夫戴恩赛合葬。

戴恩赛、孙琬夫妇墓外形十分奇特，是一座塔形墓。

塔身镌刻着“戴公恩赛之墓”，塔的基座刻着“戴母孙琬夫人灵骨谨葬于此”。可能是因地制宜，将塔的基座刻上妻子的姓名成为塔形夫妻墓。孙琬生前相随丈夫一生，死后夫妻永远相伴。

戴永丰（1923.4.29—1952.3.19）是戴恩赛和孙琬夫妇的第二个孩子，1948年5月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1950年春入读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研究生，从事畜牧免疫学方面的研究。戴永丰生活俭朴，为人忠厚寡言，醉心于研究工作，极少交际。1952年初，“五反”运动开始后，戴永丰积极报名参加，因政治上一贯表现较好，要求进步，获得学校和系的批准。

戴永丰被分配到广州市东山区“五反”工作队，住在培正中学内，入队后的第三天晚上，工作队和有关单位联欢，戴永丰极为高兴，和大家一起跳集体舞。第四天（3月19日）早上4点多钟，戴永丰起身小便后，即觉气喘咳嗽，且吐血。为了不让别人知道，用毛巾紧紧地堵着嘴巴，继而鲜血夺腔而出，四处喷射，经抢救无效，于6时左右去世。

台湾《传记文学》1981年4月号上刊发庄政《孙中山的后裔》一文，其对戴永丰的记录云：“……滞留大陆，据传对中共不满，时有怨言，致遭忌恨而被痛殴，卒至咯血而死，殊足痛惜。”孙霄著《孙氏家族一脉》一书对戴永丰的死亡原因的追踪有较大篇幅。结论为患“粟粒型急性肺结核”。司徒倩的《孙琬回忆》说戴永丰在岭南

大学教书，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遭迫害致死，在宿舍暴毙而亡。

事实真相如何？《参考消息》1981年6月15日刊有戴永丰死因《调查附记》：戴永丰不幸死亡，学校、公安机关和“五反”工作队极为重视。一面电告澳门亲属，一面将遗体送入岭南大学医学院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作病理检查。由国内著名的病理学专家秦光煜教授亲自解剖，发现死者患有慢性干酪样肺结核，窒息而死。华南医学院（今中山大学北校区）病理科1951—1952年《尸体解剖记录书》第19卷中存有《戴永丰死亡原因鉴定书》，而不是有人说的死于“粟粒型急性肺结核病”或被迫害致死。

戴永丰死因《调查附记》发表后，庄政先生对戴永丰的生平、死因作了更正。1986年11月12日，台湾《自立晚报》刊发庄政《国父直系后裔今昔概况》一文中，对戴永丰的身份从“曾任大学兽医教授”改为“岭南大学畜牧系为研究生”，改“被痛殴，卒至咯血而死”改为“因患肺结病，咯血致窒息而死”。这是历史学家的态度。

戴永丰死后，安葬在岭南大学坟场（今中山大学校内西区坟场），安葬时，天下雨，岭南大学各学院均派师生代表参加追悼安葬仪式，追悼会由畜医系主任邝荣禄主持。

戴永丰墓至今犹存。马年春节前夕，即2014年1月21日上午，笔者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罗春林先生前往中大西区坟场，凭吊戴永丰墓，献上鲜花，清理周围杂草。墓碑为大理石，高约60厘米，宽约30厘米。碑石正

中镌刻“戴永丰之墓”，右上角书“生于1923年终于1952年”，左下角书“岭大畜医系立”。所有字均填上红漆，格外显眼。1981年6月25日戴成功曾去拜祭过，并面告笔者，她准备将其弟遗骨迁至香港与父亲墓一起，后未成。

戴成功（1922.3.17—1991.4.9），戴恩赛和孙琬的第一个女儿，终生未婚嫁。1955年父戴恩赛逝世后，一直在澳门陪侍母亲孙琬，1979年母亲去世后，她一人独居澳门，无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起任广东省政协委员至逝世。

孙琬逝世后，中国驻澳门机构“南光行”通知戴成功，从1979年7月开始停发给孙琬的3000港元生活费。为解决生活问题，1979年6月29日，戴成功写信给邓小平，请求“今后每月仍照以前所给之生活费（3000港元），使余之生活得以安稳，则不胜感激矣”。笔者相信，中国政府会按以前照顾孙琬一样照顾戴成功至终老。

1991年4月9日，戴成功因患糖尿病于澳门逝世，终年69岁。

中共广东区委第一任军委书记张伯简

谢燕章

在中共广东区委早期的主要人物中，人们大都以为周恩来是第一任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其实，第一任军委书记和军事部长是张伯简。

192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指示，已有党员三十人以上的支部，可建立区委。于是，已超过三十个党员的广东支部，即成立了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亦称两广区委）。

区委成立后，进一步健全组织，工、农、青（包括学委）、妇委均选出部和委的负责人，唯独选不出军委书记。

1923年春天，中共中央派来了张伯简到广东担任军委书记兼军事部长。

张伯简，云南省白族人，其父是世袭的族长。他秉承了白族人民的刻苦耐劳、顽强拼搏而又善良正直的美德，要求进步，关注外面世界的发展。十岁后便说服父母祖